

世界桥牌皇后自述



我在中国的十九年

杨小燕 特里·奎恩 著
陈厚铭 杨慧林 译

我在中国的十九年

世界桥牌皇后自述

杨小燕 特里·奎恩 著

陈厚铭 杨慧林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原名《二女儿》)是美籍华人、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女士的自传。书中以其十九岁前的生活经历为线索,生动地描写了她所处的家庭和社会,当教授的父亲反对封建势力的胁迫,却又不得不屈从于传统;渴望平等自由的母亲却身体力行着专制。此外,如封建家庭的代表祖父、劳动人民的缩影厨子以及作者的同学、老师和姐妹,都有其栩栩如生、有其单纯或复杂的心理世界。同时,作者亦大胆地写到了少女对于性的启蒙,也不讳言她的两度婚姻、她的并未产生爱情的所谓“初恋”……由于作者细腻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思想状况,揭示了旧中国的腐朽和落后,使本书一跃而成为一九八四年度全美畅销书。

我在中国的十九年

世界桥牌皇后自述

杨小燕 特里·奎恩 著

陈厚铭 杨慧林 译

•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60,000 插页4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6,000 册

书号 10228•249 定价 1.70元



世界桥牌皇后杨小燕



杨小燕的父母
1978年摄于汉口



杨家四姐妹在燕京
大学校园（右后为杨小
燕）



15岁时的杨小燕



杨小燕16岁在上海



杨家三姐妹1983年在汉口(左起琼、杨小燕、艾丽丝)



杨小燕于1985年12月2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获得的1984年世界最佳打牌手所罗门奖的奖品授与万里。

献给我的丈夫查尔斯

——始终不渝地信任我

杨小燕

献给我的妻子简

——始终鼓励我写作

特里·奎恩

目 录

第一章	汉 口	1
第二章	北 平	5
第三章	湖 南	46
第四章	重 庆	106
第五章	上 海	168
第六章	汉 口	216

第一章 汉口

我知道父亲已不久人世。我看过太多的死亡，不会认不出这些死前的征兆：两眼无光，皮肤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我气冲冲地对着母亲，她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这种情景真是太反常了：她不理她的丈夫，也不理我，而我已有三十二年没有和她见面，并且将在第二天早晨返回美国。此刻，母亲正在接待她的两个朋友，向他们展示前一天我给她照的几十张“一次成像”的照片，所有的照片照的都是她。她穿着我从美国带来的衣服，炫耀着我从香港给她买来的大量物品：一个电冰箱，两个面包烤箱，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一架照相机，两块手表，一台大型计算器和一架缝纫机。这些东西搬进家后，她和父亲这间狭小的住房简直就没有回身的余地了。

我这些年曾给父母寄回了许多外汇，母亲把我看成一个有钱的美国公民而估算我的权势，她觉得十分惬意。我现在了解到，这些外汇的大部分都上交了国家，^①因为他们住在远离海岸线一千里的小城市里，而这里的日用品供应很缺，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高档商品更是无货。她曾写信给我说：“给我带回单子上所列的物品。我们街道领导曾替我打听过，据说，这些物品将要在广州过关，有些上税100%的物品可以减免一部分。”她听到的消息是确

^① 此系作者误会，国家并未收过国外寄回的外汇，只是转换成侨汇券形式。

实的。

这样评价我的母亲，也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自从一九四九年我飞抵美国以来，父母直接寄给我的第一封信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才收到的；信是父亲写的，不过，就象母亲写的一样，而且带有她的尖酸刻薄味儿。我收到这封信是在五月三日的早晨，这一天正是我丈夫最新的一条船在德克萨斯州的奥兰治城命名和下水的日子。我们邀请了上千名客人参加盛会，我想谁也不会注意到在这个本应当是欢乐的日子里我所感到的痛苦。从小我就学会了如何掩盖自己的感情，那一天的早上和下午，我本似乎应该被这一盛典吸引住，但是我却只想单独一个人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封来信。我感到了已被长期忘掉了的创伤的苦痛。我明白自己又落入母亲的权力掌握之中了。

三十多年来，我没有听到她的任何消息。我寄钱回去并请求来信以及我写信告诉她我生了三个孩子之后，也都没有收到来信。同时，父亲也没有来信，我怀疑，母亲一直在选择某一合适的时候才许可父亲写信。是我的大姐艾丽丝来信告诉我家里人的健康情况，也使我知道寄去的钱已收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写过七封信，在政治解冻以后，也写过七封信——有礼貌的短信，却充满着无声的感情。这回父亲写来的短信，笔体仍然秀丽，但这仅只两页的信，却象重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口袋里。信中的请求并不通情达理，简直是毫不客气。信中说：“现在你务必返回汉口家里。作为父母，请求子女垂怜，乃可耻之事，但我即将去世，望能见到次女。据她的听话的姐姐告诉我们，她在西方世界已富贵发迹。”我只需看几个字，就明白我要对付的是谁了。这就象母亲强迫我坐在椅子上，用她的刺耳的声音在教训我一样。她很聪明，不自己写信，否则我可能就不回去了。

母亲巧妙地击中了我的要害，她威胁着要消灭我在中国生活中最宝贵的记忆，也就是我和父亲之间的热爱。记得在和父亲分别的那天，我们俩单独地谈到了这种情感。我总是怀念着当时他温和的声音和他的面容，而不愿想起他在母亲严厉无情旨意下的软弱表情。这封来信企图向人们显示我们父女之情的破裂。

信封里还附有一张照片。如果母亲没有想到在信封里附一张我父亲的照片，或许她不能引诱我回去。在轮船下水的那天，我一有时间就仔细地想那张我总忘不了的照片。我已经看到了她要我看到的，就是即将去世的人的明显的象征。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五十四岁的高个子男人，是个精神饱满的中国人，而现在他却枯萎成了一片落叶。她不让我保留我对父亲的一张理想的图象，也不让我忘却我早已忘掉的在中国的痛苦岁月。父亲的肩膀是圆的，没有血色的双唇被折磨得露出苦笑。头发虽相当厚，但已经全白了，乱堆在左边，就好象他从那张病床上支撑起来勉强照了这张相似的。看起来，他在形体和精神上都小了。从前我看到的他是一个在教学和写作方面驰名全中国的光辉人物。他的肩膀宽大，皮肤白净光滑，他的微笑，带着吸引人的魅力。毫无疑问，母亲把父亲身体上的这种退化当作她的一张王牌。但是，有讽刺意味的却是：我父亲的眼睛说服了我回家，他的这一特征一点也没有改变。

轮船下水的那天下午，我托辞离开了用五颜六色的条纹布搭成的轮船，独自在休息室里再一次凝视从父亲的照片上射出的那种年轻人的眼光，那饱含着热情与忧郁的目光。父亲总是显得在往远处看，好象已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弄得失望了。我感到这种穿透一切的、超然的眼光，多年来一直凝集在那双柔和的褐色眼睛里。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能了解我父亲眼里的意思，而其他人却看不出来，也不想去了解。他经常和我谈我看到过的一些事。照片上清楚地显示出来的不仅是痛苦和耻辱，而且最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还显示出一种安详的胜利。我羡慕父亲那样的自我承认的表情和显而易见的战胜过去的胜利。我却是抛弃了我的过去，而没有征服它。当我初到美国时，我开始过新的生活，我避开了我的记忆中过去看到的一切。我从父亲眼中看到的智慧在责怪我，并且使我考虑走另一条道路。现在或许我已经坚强到足以和我在十八岁时逃避的所有事物达成谅解的地步了。

第二章 北平

第一节

母亲用英语喊着说：“艾丽丝，请下来，给我们的朋友作点游戏。”虽然母亲向来没有去过外国，但是她却让我的受过美国教育的父亲以“天堂之国”的语言习惯来培训她，一直到她能差不多和父亲一样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李妈，把凯瑟琳领来。”

李妈是我的看妈，她只懂北平话，但是她比我们谁也不差，她知道那天晚上要叫她干什么。在事前安排好的暗号指示下，她把我的硬领西式外套弄直，又用刷子把我的头发刷了两次，然后推我站到正在楼梯口的艾丽丝大姐和她的看妈徐妈的后面。我们走下楼来。

我记得这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母亲在这一年把二妈改称为李妈。但这种社交集会可能会同样地举行几十次。由于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没什么两样，因此我也分不出这是哪一次的集会了。我们住房的底层楼，在晚上总是点着蜡烛，摆着珠宝。晚饭前，我父亲的同事，当地的国民党官员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外交官，都在我家宽大的客厅里成群地打转，空气中弥漫着奇装异服的太太们散发出的浓烈的西方香水味。他们在摆着上浆的餐巾和银质餐具的餐桌就座之前，先吮吸着仆人们送过来的鸡尾酒，一点点地吃掉摆上的小吃；他们还浏览着父亲收藏的英文小说，或是在我母亲那架

留声机放出的大乐队演奏的柔和乐声中谈话。

我们在北平的享受应有尽有。父亲在三个著名大学之一的燕京大学教社会学。在那个时代里，教授的地位很高。尤其父亲还是系主任。我们住在校园中的一所洋房里，我们家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佣人、一个花工；另外，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看妈。我们吃最好的食品，穿最贵的衣服，也把房屋布置得非常讲究。每到周末，我们就接待北平学术界和国民党政界的人士。我的父亲是在孙中山成立国民党之后不久于一九一三年加入国民党的。

我们的家和北平其他人的家不同之处并不只在财富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我的家很象一个西方家庭。由于燕京大学是由美国教育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由美国捐款人资助，而且大部分的教职员是在美国出生的人，因此母亲可以看到每一期的新书和杂志。这些书和杂志刊载着美国流行的服装式样以及房屋布置、风俗习惯、食谱和音乐等——总之，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缩影。如某一个月有一对教授夫妇借给我们一本书《更好的家庭和花园》，就可能在下一个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在我们家举行一个晚会，客人们坐在按照杂志所推荐而布置好的起居室里，呷着马哈顿酒并听着肖阿提(Artie Shaw)的唱片；然后还能吃上按照同一期杂志的食谱栏中所写方法而烹制出的菜。

我记得，美国人曾公开地钦佩我母亲独出心裁的智慧，或者至少他们以一种感激的怀乡心情陷入在模拟的西方式的气氛之中。母亲以这样的精力装模作样地达到了初步的效果，她是如此地公开渴望得到赞扬，以致我们的在外国出生的客人总是赞不绝口。不过现在我不敢想象父亲的同事们会怎么样想。按照中国人装饰的基本原则，家具或是横着摆，要不就是竖着摆，但是在我们的起居室里，椅子和长沙发却在中间附近摆成对角线式，要

不就是不采用直角摆法而是乱放在犄角里，客人们坐在这些家具上，不知道会怎么生气呢。而且在我们的家宴上，大家得先作感恩祈祷，然后再拿着从香港买的银器去领羊肉，这种羊肉是我母亲硬让蒙古屠夫按照皇家烤羊肉的样子做的，并且她自己还煞费苦心地在宴会之前把羊皮纸剪成十六个纸花来装饰羊肋骨的顶端；客人们虽生来就是基督教徒，或者受过基督教的教育，但对这种做法一定也难以消受。我们的中国客人怎么对待我母亲的吸烟习惯呢？她的吸烟，不过是表示她的解放。但是她看不起当地制造的各种牌号的烟，她说，她只能将就吸美国的红光牌烟，这种烟她是从北平的一个专门卖烟的商人那里得到的。母亲要求在她举行的社交晚会上都得说英语，而且男客人必须穿西服。这些规定，对于她的本国出生的客人的文化教养来说，大概没有困难，因为同这个大学有联系的人，对这些都已习惯了。但是当我和艾丽丝穿着格子裙和稀奇古怪的皮鞋跑着小快步在晚饭后给客人们表演节目时，这些人会怎么想呢？母亲总是微笑着，叫我们的看妈走开，然后对着客人们来介绍我们。在客人们的一片赞扬声中，她走回她的扶手椅那里，把一只手臂垂在身后，好象是一个心不在焉的女演员。我的姐姐和我就行了屈膝礼，然后就位。姐姐有音乐天才，她可以用古琴弹奏各种中国的传统调子；而我只会表演我在燕京附小学会的河北省民间舞，这当然不能使母亲满意。艾丽丝还会自己走到老式钢琴那里弹唱着“Teepers, Creepers”歌（这是三十年代在美国流行的一种顺口溜歌，可以边唱边跳），我就随着琴声跳起“查尔斯顿”狂舞，把母亲从二十年代电影中学会的夹膝、打臂、脚跟打点等合并在一起乱跳。她在口头上教过我一些常规动作，自己却没有胡乱地跳过一步，她只是让我猜想每一步应该怎样跳，一直到我跳对了为止。

现在对我来说，没有比在北平举行的那些晚餐会更奇怪和更不协调了。那时的情景是：宽大的客厅里摆着过多的沙发，墙上挂的既有欧洲的图片，又有中国式的轴字画。当我在地毯上蹦蹦跳跳的时候，涨红了脸的美国入便在欢乐中起哄。中国客人们则笔直地坐着，用有礼貌的微笑掩盖着他们真正的感情和想法。我看到父亲自豪地站在母亲座椅的后边，有时用手拉住皮腰带，有时把双臂放在穿着合体的西装的胸前；母亲穿着华丽的旗袍，带着红宝石耳环，穿着缎子做的跳舞鞋，她很美，只是因面部肌肉紧张显得美中不足。母亲随着钢琴的节奏，呆板地点着头，就好像正在接受为她自己表演而得到的赞美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她的表演。现在她分享我的微小的胜利，就好像她曾经分享我父亲在职业上的成就一样；或者象有一次她私下所说的那样，她造成了我父亲职业上的成就。

我的母亲叫周秀和，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里，她是一个好强的女人。我还没看见过有什么人能象她那样，有这么坚强的意志，能如此善于控制她周围的人，并使一个中产阶级的家享受贵族生活方式。她带着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要求被人们承认的野心与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她为我们也确实牺牲了自己。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充满了活力、热情和野心，不过她早生了几十年。假若没有清末的僵化风尚束缚着她，她一定会在某项事业中大显身手。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一次革命的早期，她也尽力抓住每一个解放的机会。

她一开始就得到了有利的条件。我的外祖母是裹脚的，但是她并没有强迫我母亲屈服于二十世纪十年代仍然相当普遍存在的习尚。一九一一年，我母亲八岁的时候就剪去了清朝流行的辫子，